

中统



告诉你一个
真实的中统

时举 朱熹 编

● 整合权威档案资料，
全景揭示中统内幕，
● 再现血雨腥风的惊悚时刻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 / 1

第一节 中统的由来 / 3

第二节 中统与二陈 / 8

第三节 中统和“CC”系 / 12

第四节 中统的秘密组织——特工总部 / 22

第二章 干粗枝叶茂——在全国各地的中统 / 33

第一节 西南铁三角 / 35

第二节 西北特务行 / 46

第三节 重庆调统室 / 55

第三章 中统的“策反” / 67

第一节 “策反”顾顺章 / 69

第二节 “叛徒”陈治平 / 79

第四章 中统电讯情报网 / 89

第一节 网络形成 / 91

第二节 潜伏和侦察电台 / 105

第五章 破坏民主运动 / 111

第一节 于子三事件 / 113

第二节 喋血春城——“一二·一”运动 / 118

第三节 武汉“六一”惨案 / 130

第六章 中统的要人们 / 139

第一节 中统首脑陈立夫 / 141

第二节 中统巨擘徐恩曾 / 153

第三节 中统核心人物叶秀峰、张冲 / 163

第七章 中统与军统的恩恩怨怨 / 173

第一节 一山难容二虎 / 175

第二节 戴笠斗垮徐恩曾 / 186

第八章 国共大斗法 / 197

第一节 廖承志被捕 瞿秋白蒙难 / 199

第二节 伍豪事件——周恩来叛变了？ / 209

第三节 中共的反击 / 215

第九章 中统和汪伪的斗争与勾结 / 227

第一节 美人计杀丁默村 / 229

第二节 双方的勾结 / 238

第十章 中统后记 / 249

第一节 中央党员通讯局 / 251

第二节 党员通讯局活动片段 / 258

第三节 内政部调查局的成立 / 266

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中统局

第一节 中统的由来

一提起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大家的脑海里可能会马上浮现出大名鼎鼎的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但实际上，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除军统外还有其他能和军统组织力量不分上下的特务组织，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为了更好地让大家了解中统，我们先从中统的历史沿革说起。中统组织从开始到结束使命，各个阶段可以分为调查科、调查处、特工总部、中央调查统计局、中央党员通讯局、内政部调查局。

北伐胜利不久，国民党中央从广州迁到了南京，遂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后来的中央组织部）内设立调查科，由陈立夫兼任科长。他当时是组织委员会的秘书，事务繁忙，遂向蒋介石请辞科长一职，不久改由叶秀峰任科长，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长。调查科成立时人数不多，其调查任务是党内的派系斗争。内部初设采访、整理两个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采访股总干事开始时为杨剑虹，其为上海青帮成员，1928年秋由于青帮内部争权夺利，杨剑虹被迫自杀，由曹立瀛继任。曹立瀛被国民党中央公费送美留学后，由曾三省继任。1938年夏，曾三省调任广东省党部委员，张冲继任该职。整理股干事最初由吴大钧担任，吴大钧任科主任后，由干事濮孟九继任。起初这个科才十几个人，几张写字台，自从以二陈为头子的“CC”系自1928年掌握国民党组织部大权以后，经过陈立夫三年的“整顿”和“改组”，先后在各省市设立了“指导委员会”，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派遣“CC”系的大小喽啰担任指导委员，成立新的省、市党部，将原汪精卫为首的政治势力、胡汉民政治势力、丁惟汾势力排斥出去，逐渐掌握了各省市党部大权。这些占了各省市党部大权的人员还需要进行训练，不然无法胜任工作，因此不久就开设“特工训练班”，收罗了

不少人。通过二陈的“努力”，调查科的机构迅速膨胀，1930年增设了特务组和言文股、文书股等机构，人员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般的特务活动由采访股等部门担任，而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谍报活动、密谋策划以及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任务都由特务组负责，特务组的办公室不但中央党部其他部门的人员禁止入内，即使调查科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言文股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物，制成剪报，择其要者送有关方面参考，以供掌握中共及其他党派的最新动态。与此同时，调查科也开始向上海、武汉、开封等各大城市派驻特派员，比如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后改鲍善甫；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开封特派员黄凯，配给专用电台以供联络。后来逐步扩展到全国各省与特别市、铁路、电信等行业，普遍设立了各级各单位的“特务室”。到1931年7月，该科人数已达五十余人，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中人员最多的一个部门。然而陈立夫还是不满意，当看到原属于国民党政府司法院的“反省院”是专门对政治犯，特别是共产党政治犯进行欺骗诱叛活动的机构时，就一直主张由调查科直接掌管。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调查科从1932年开始逐渐接管“反省院”的领导位置，控制它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折磨共产党人的意志，使其就范或叛变。但是真正使蒋介石认可调查科的能力是在“顾顺章案”（另章节介绍）中，从那以后，蒋介石大力支持调查科。调查科的“黄金”发展时期不是在二陈手中的时候，而是在与二陈有亲戚关系的徐恩曾指导下，发展成约二十万人，成为蒋介石比较得意的一个部门。后来调查科改为调查处，但是内部的组织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在南京道署街徐王府瞻园内成立特务工作总部，由徐恩曾任主任，张冲任副主任，濮孟九任秘书。特工总部时期是中统组织最反动猖獗的时期，特务们自夸是特务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也是中统发展的特殊时期，在下一节的内容中将会集中介绍特工总部的情况以及它的罪恶活动。

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渐趋稳固，国共斗争成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蒋介石为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加强反共特务活动，于1935年将“CC”系的特工总部和复兴社的特务处合并组成军事委员会情报局，又称“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陈焯任副局长。局下设三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主管党派调

查；第二处处长戴笠，主管军警调查；第三处处长先由陈焯兼任后由丁默村接任，主管邮电检查。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但实际上还是各搞各的。特工总部和特务处的组织机构照常活动，那个军事委员会情报局实际上只是一个汇报机构而已。

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已经从南京迁到了武汉，全国抗战热情高涨，不少爱国青年学生纷纷投奔去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走上了抗日的革命道路。蒋介石为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学生，遂派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负责收罗青年学生，因而陈立夫就不能再担任情报局局长，陈立夫便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两个调查统计局。据陈立夫自己的口述，当时对蒋介石的建议是这样说的：“一个人有两只眼睛和两只耳朵，才能做到兼听则明；一只眼睛，一只耳朵，难免偏听则暗。所以应当成立两个调查统计局，把原来的情报局的第一处扩大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把原来的第二处扩大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蒋介石接受了陈立夫的建议，决定成立两个调查统计局，并规定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局长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局长由侍从室主任贺耀组（原名耀祖，字贵严）兼任，戴笠任副局长，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初成立时，只有三组八科。第一组组长梁辅丞，下设两科：第一科科长张炎茂，主管总务；第二科科长张国栋，主管敌情调查；第二组组长王思诚，下设三科：第三科科长周光亚，主管党派资料；第四科科长王大鈺，主管党派情报；第五科科长陈庆斋，主管行动；第三组组长高骞，下设三科：第六科科长熊秉皋，主管党员调查；第七科科长柳靖一，主管经济调查；第八科科长庆深庵，主管政治情报。后来中央秘书处为配合中统局的业务活动，把中央党部的交通处和统计处划归中统局管辖，组织机构有所扩大。中统局增设了人事室，主任章祖模；会计室，主任李光灼；秘书室，主任濮孟九；机要室，主任徐兆麟；训练委员会，主任王杰夫；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思诚兼；研究室，主任顾建中。

抗日战争结束没多久，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始进行，在会议期间，各民主党

派一致要求蒋介石开放党禁，取消特务，当时蒋介石被迫答应了这一要求。等到会议结束后，蒋介石便命令撤销中央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在《中央日报》上刊登消息，公诸国人。但蒋介石出于自身的考虑，还是把原来的中统局换汤不换药地保留了下来。当时蒋介石召见中统头子叶秀峰面授机宜，要他把中统组织系统地转移到各个行政部门。叶秀峰遵照指示，首先与国民政府主计处洽商，在主计处统计局渗入中统组织，把中统局的党政处全部转移过去；后来内政部人口局成立，又把中统局的第四处全部转移过去，称为“登记处”；后来又与经济部部长陈启天洽商，把中统局的统计处全部转移过去，称为“特种经济调查处”。1947年夏天，中统局开善后会议，召集各地方的特务头子齐集南京，并邀请了陈立夫参加。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分散转移不是办法，要求陈立夫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并威胁陈立夫如不妥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就不听党的话了。随着内战形势的急转直下，陈立夫与蒋介石合谋，决定把中统局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把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局长叶秀峰，副局长季源溥、郭紫峻。局下设：指导处，处长杜衡；研究处，处长徐兆麟；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泮；登记处，处长张国栋；党政处，处长王秀春；交通处，处长袁更；秘书室，主任王述先；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计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何之澄；训委会，主任蒋静一；纪审会，主任李尚春。

随着时局的变化，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了更好地使党通局发挥作用，1949年又将其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但内政部调查局的成立颇费了一些功夫。国民党实行“宪政”后，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再也不能从国库开支了。当时蒋介石提出“党员从政”的口号，号召党的机关尽可能地向行政部门转移。中央党员通讯局当然也是党的机关，所以也得全部向行政部门转移。虽然中央党员通讯局在1945年已经转移了一次，但这次却是完全地转移。因为此前虽已向主计处统计局、内政部人口局、经济部等政府部门转移了三处，但其余庞大的机构还没有着落。当时拟仿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体制在司法行政部内设立调查局，虽然也和司法行政部商定并拟了

一个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组织法案送立法院审议，但是立法院在审议时认为司法行政部是司法的神圣机关，不能让特务机关混入其内，遂遭到了否决。后来又与内政部商议，在内政部分设调查局，再送立法院审议。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后，此项决议才由立法院通过。决议通过后，内政部调查局遂在广州成立，局长季源溥，副局长张益民，局下设四处四室。指导处，处长朱凌云，副处长邹春生；研究处，处长徐子政，副处长黄九成；总务处，处长陈庆斋；交通处，处长袁更；人事室，主任李裕德；秘书室，主任王大鎡；统计室，主任原汾；督察室，主任刘光煜。内政部调查局成立之后，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四面楚歌，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内政部调查局采取了狡兔三窟的策略，把内调局分散为四个办事处：“广州办事处”、“海南岛办事处”、“重庆办事处”、“云贵办事处”。不久全国解放，他们便一齐都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内政部调查局由蒋经国进行了大大的改造。第一步，派一批军统人员转业到调查局，人数约有四五十人之多，由沈之岳率领并任督察室主任，其余人员在局内分任科长、专员，或在外站当副主任、主任。第二步，调局长季源溥（1957年）为内政部政务次长，由不属于“CC”系的张庆恩继任，并派总政治部组长魏毅生来任副局长作为过渡。第三步，派沈之岳出任调查局局长。至此，改造中统已大功告成，中统的传统也至此而绝。沈之岳任职的时间很长，每年都要举办训练班，吸收新血液，而将中统原有人员陆续淘汰。70年代末期以前，调查局的主要工作对象仍是共产党，但在60年代初期，调查局却在蒋氏父子的指示下，匀出另外一只手狠狠地打击了活跃于岛内外的台独分子。蒋介石撤退台湾之初，特务组织在岛内进行强力压制与扫荡，台独分子无法立足，纷纷逃往海外建立流亡组织。日本不甘心台湾殖民地重归中国版图，早在台湾光复前夕，若干日军官佐就处心积虑卵翼台湾士绅阶级，阴谋策动台独运动，东瀛也一度成为台独分子的避风港。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台湾方面沈之岳出任调查局局长，以剿抚兼施、恩威并济的手段才重创了岛内外台独组织。

从中统的整个脉络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二陈与中统局的成立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了更好地说明中统局和二陈的关系，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具体详细的介绍。

第二节 中统与二陈

在1926年即北伐战争以前，国民党中央在广州成立了一个中央俱乐部，这个中央俱乐部就是由二陈（陈果夫、陈立夫）所组织的。当时党内志同道合的人每天都去俱乐部聚会。因“中央”、“俱乐部”两个英文单词开头的字母都是C字，所以一般人将其简称“CC”系。亦有人说“CC”系是指二陈，因为“陈”字的英语字母起头也是“C”。从这两种说法中，都可以窥见当时到中央俱乐部去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人其实都是二陈这一系的人，以后中统内部的大部分人也大都属于二陈系统的人。然而即便如此，中统和“CC”系之间也不能简单地互相等同，二者之间的差异将在后面进行具体介绍。

“中央俱乐部”在上海成立之初只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原名陈亦同）、萧铮、程天放等为主，展开活动，并拥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这同时也埋下了他们内部之间矛盾斗争的种子。嗣后各省市党部的职员也加入该组织，成员日渐增多，慢慢地就发展到了一百多人。同年12月，南京的“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分赴各地就职。丁惟汾在广州时，已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此时也率领一部分人北上布置秘密工作，这部分人以丁惟汾为中心，被认为是丁惟汾派。戴季陶则到南京去，负责为蒋介石策划政治阴谋。所以，“中央俱乐部”便成了陈果夫单独领导的反动小组织。

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后，仍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也仍由陈果夫任副部长，负实际责任。在这个时期，“中央俱乐部”的成员在陈果夫的指挥下，更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们除了继续拥护蒋介石，排斥其他派系或小组织之外，更主

要的是一次一次地发动反共活动，主持中央及各地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进步人士，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正因为他们政治上起了更大的反动作用，所以也更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到了1929年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蒋介石任命为秘书长，从此与组织部互相呼应，在党内控制一切，局面顿时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

早在国民党执政之前，湖州二陈就与蒋介石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至于为什么二陈和蒋介石联系如此密切，这就跟二陈的叔父陈其美有很大的关系。此二人是中华革命党江浙派领袖陈其美的侄子。蒋介石于1906年在日本首次遇见陈其美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警法，从那时起陈其美便成了蒋介石成长的楷模。1907年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军事训练学校研习重武器课程时，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蒋介石在陈其美手下当过一个团长，后任上海的军事头目，在进攻杭州的浙江总督衙门时领导过陈其美的一支“敢死队”。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蒋介石继续被认做是陈其美的忠实追随者，直到陈其美于1916年被袁世凯的秘密特务暗杀，蒋介石一直对其忠心耿耿。此后，蒋介石继续同他前师的其他追随者和亲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这两个来自离蒋介石的家乡不远的吴兴的陈果夫和陈立夫。

1920年，蒋介石在政治流亡期间曾积极介入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戴季陶和张静江根据孙中山为中华革命党筹资的命令而协助建立起来的。四年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接着他当了党的征募人，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为军校招收新生。与此同时，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从宾夕法尼亚学习了两年后回国。他在那里的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煤矿工程的学位，并在斯克兰顿（Scranton）的地下煤矿工作过。1926年，陈立夫谢绝了在山东煤矿工作的机会，成了蒋介石的英语机要秘书，在北伐战争中当他的密码负责人。在反共分子组织扶植蒋介石的过程中，这两兄弟很快成为主力。到了11月，他们协助在广州的革命同志会中建立了浙江社。次月，陈果夫去了南昌，企图从中国共产党手中夺回江西革命党支部，并与段锡朋和程天放领导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B团）挂钩，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成为“CC”

系的核心人员。“CC”系于1927年6月正式成立，成为革命同志会的浙江社、西山会议派（邹鲁、张继、谢持等十几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或干事于1925年11月23日集聚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称为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AB团及执杖派（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成员爱用棍棒来恐吓共产党对立派）的大联合。“CC”系在国民党内变得如此强大，就在于二陈这两兄弟对组织部十年的控制。

组织部主要负责建立和审查所有省市级党组织，并向政府、军队、工会和青年组织里的党支部派遣中高级人事干部。陈果夫于1926年成为该部部长，任职六年。他的弟弟陈立夫负责该部的调查系统，该系统对所登记党员的政治倾向集中存档。1926年5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由蒋介石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陈果夫为代理部长。出于工作的需要，在部内设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负责对党员情况进行调查登记。这是一个纯党务工作机构，并非特务组织，没有组织编制和正当的经费来源。该部也向蒋介石送一些情报，从蒋介石处得到一些经费，这虽然不正规，但却是国民党中央特务组织的起源。就这样，完成了蒋介石和二陈的合流。

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因反共“清党”及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开始扩展其工作范围，扩充为“情报”与“编造”两股，人员也由起初的十多人增加了数倍，新增加的人员都是1928年6月由蒋介石从中央党务学校的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到任后具体从事“调查党员思想及派系隶属”的工作，从这以后，中组部党务调查科的职责开始向特务工作转化。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他在全面重掌党政大权之后，痛定思痛，决定扩大自己的特务组织机构，以应付党内外斗争的需要。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稳固了他的统治秩序，月底，他采纳陈果夫的建议，决定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专司负责党务情报搜集工作，任命其秘书陈立夫为科长，不久后由张道藩、叶秀峰先后任科长，1929年改由徐恩曾任科长。当陈立夫于1928年着手建立国民党的第一个特务组织的时候，戴笠还是黄埔六期的学生，毛人凤则还只是一个县政府内终日伏案抄抄写写的小秘书，这两个著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

此时都还是无名小卒。在陈立夫亲自主持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之后，对调查科的职能作了新的规定：调查科除了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之外，其主要任务是集中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情报，配合国民党警宪机关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秘密组织。这样一来，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由原来的党务部门，变成了一个专门镇压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异己力量的特务机构。这个调查科也就是后来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局的前身。建立特务机构正是蒋介石本人的意图，经过下野到重新上台的一番折腾，蒋介石深知要建立对党、政、军的独裁统治，就必须严厉镇压国民党内的各派异己力量。但国民党表面上还是要维持“五权共和”的局面，蒋介石还不能肆无忌惮地公开动用国家机关来打击他的政敌，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唯领袖之命是从的特务机构。

二陈和中统局的成立有着紧密的关系，二陈领导下的“CC”系自然也和中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节 中统和“CC”系

一、“CC”系

1. 什么是“CC”系

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自相标榜，实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不但党外有党，而且党内的派系也非常之多。早期就有胡汉民派、丁惟汾派、西山会议派等等，“CC”系自然也是党内派系之一，虽然“CC”系形成的时间比较靠后，但最后却后来居上。“CC”系的开始要从1933年说起，当时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曾组织过一个不公开的组织“青白团”作为二陈搞党派活动的领导核心。二陈的目的是网罗各地一些思想一致的、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加入“青白团”，如河南的陈泮岭，东北的王星舟、齐世英、刘不同，河北的梁子青、时子周，山东的庞镜塘，湖南的邵华，山西的郭紫峻，安徽的高宗禹，上海的吴开先、潘公展，蒙古的李永新，以及洪陆东、陈访先、马无放、骆美奂、方治、周学昌、张冲等等。嗣后，“青白团”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它的不公开不过是掩耳盗铃。与之对立的其他派系如自认为是正统的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对二陈所组织的“青白团”很不以为然，不称之为“青白团”，而称之为“CC”系，意在讽刺二陈结党营私，另立门户，这就是“CC”系的来历。“青白团”的这些人分散到各地开展活动，组织了一些“青白团”的外围组织——不同名称的“计”、“会”之类，拉拢了一批从属分子，从而使“CC”系的势力逐渐地伸展到了各个地方。

2. “CC”系对国民党各个机构的渗透

1929年以前的国民党党务大权主要由丁惟汾掌握，当时各省党部组织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丁惟汾安排的，因而当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1928年，蒋介石想把各派系捏在一起，实现其大联合的计划，决定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将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孙科（太子）派以及蒋介石最亲信的二陈都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一个全党混合性的领导中枢，使所谓“丁家党”的势力得以削弱，国民党党务权的方方面面任由蒋介石摆布。丁惟汾窥知其意，便策动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各省市党部负责人拒绝这个计划，但没有起到作用。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中，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亲信都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蒋介石自兼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二陈集团的骨干分子张厉生、余井塘任组织部秘书，陈立夫还担任了秘书长，自此，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大权落在二陈之手。第三次党代一大会议以后，二陈就以组织部长蒋介石的名义提出了整顿党务的方案，以消除异己为目标，全部解散或部分撤销各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由二陈派亲信去接管。陈果夫对党务的整顿，实际上从国民党三大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他打响整顿的第一炮是解散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会，另派傅作义、苗培成、刘不同等为整理委员，把天津市党部全部改组。二陈的亲信邵华、马克、邵汉元、时子周等都塞进了天津市党部，以至于整个天津市的国民党组织绝大部分换成了“CC”系分子。在贯彻所谓的整理党务方案的过程中，全国各重要省市的国民党委员会接二连三地进行改组，使得“CC”系分子分散到各地，渗透进了各地的国民党组织。此时全国的国民党组织几乎全部为“CC”系所把持，丁惟汾的势力或被排挤掉，或被拉入了“CC”系集团。

“CC”系把国民党党务权把持到手后，便极力向行政方面扩展势力，这项活动从浙江开始。1932年冬，陈果夫把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一期毕业生120多号人派到浙江，以佐治员的名义参加县政工作，几乎每县都有2人，协助县长搞地方基层工作。名为佐治，实是控制、分权。1934年，陈果夫亲自兼任江苏省政府主席，这是“CC”系向行政方面扩展的第二步。当时江苏的民政厅长是余井塘，财政厅长是赵棣华，教育厅长是周佛海，淮阴区行政专员是王德溥，省府里的科

长、秘书大都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甚至一部分县长也换成了这号人。当时“CC”系在江苏省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此外，杨绵仲去福建时也带了大批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其后陆续在安徽、湖南、陕西、甘肃，也都有大批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被派去参加地方行政工作。“CC”系的骨干在一个地方做了什么“长”以后，其系的专员、县长、局长、校长等等，也多由中央政治学校出身的人来担任。四川在抗战期间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四川中级以上的行政干部如专员、县长等，多由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担任。因此，到了抗战后期，“CC”系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在民、建、财、教各个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果夫的策划下，江苏省在1934年成立了一个旨在消除淮海灾害隐患的导淮委员会，由陈果夫兼任委员长，他的妹夫沈伯先任副委员长。导淮委员会不仅占有了一批国家资财，还安插了一批“CC”系的亲信，当时只做了一点点工作，淮河之害并未减除。1938年，淮河泛滥，灾情严重，大家瞠目视之，无策以对。抗战期间，淮河流域大部分沦为敌占区，导淮委员会迁到重庆，由沈伯先任委员长，照样养着一批亲信，住在綦江县继续“办公”。

二陈在政治上、行政上都有很大的势力，但是在国民党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中，从经济势力方面来衡量，陈的基础是最薄弱的。中国、交通、中央、农民四大银行均属蒋、宋、孔、陈四家的经济势力范围。蒋、宋、孔家把持中央、交通、中国三大银行，历史比较悠久，操纵也比较直接，基础相当稳固；而陈家把持农民银行却是抗战期间的事，虽然由陈果夫当了董事长，但还不能像宋子文之于交通银行、孔祥熙之于中央银行那样随心所欲、支配自如。蒋、宋、孔利用手中的银行经营外汇，组织公司，大搞外贸，别有一番生财之道，陈果夫亦看在眼里，动在心里。因此到处伸手，急起直追，也从工商业方面大抓起来。他首先在中央财政、经济各部门安插了亲信，如烟酒专卖局局长刘振东、花纱布管理局局长骆美奂、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寿勉成，此外还在财政部、经济部、粮食部的司长、帮办、科长中，也安插了一些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和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为争夺经济打下了方便省力的基础。在金融方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农民银行自不必说，还把赵棣华挤进交通银行，把吴任沧安插在中央信托局，把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拉拢过